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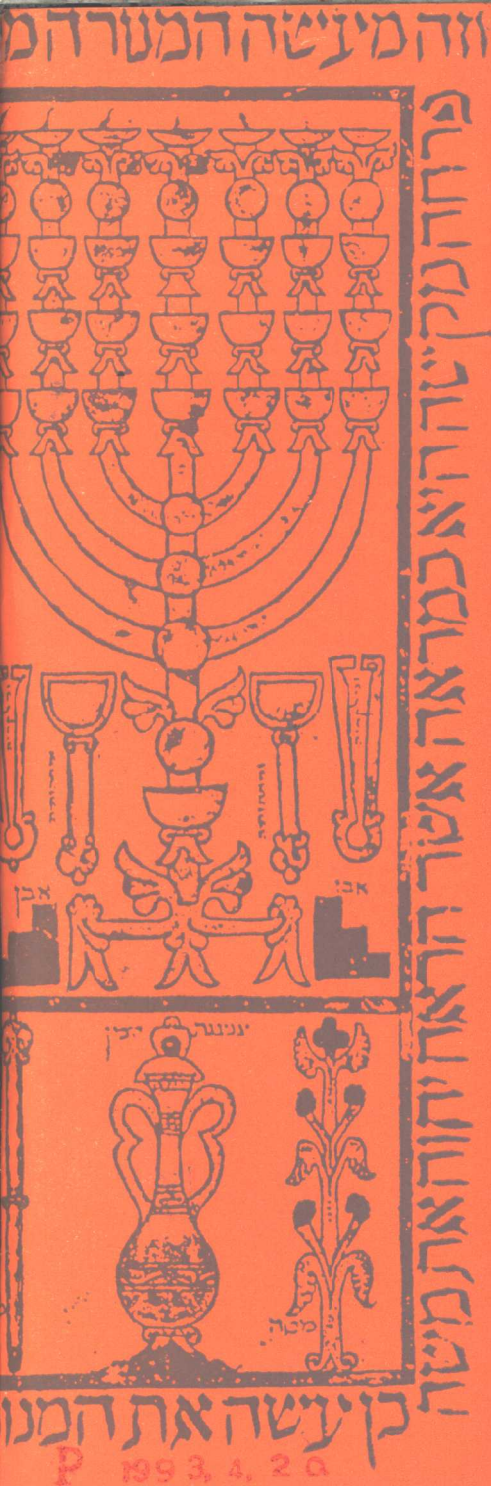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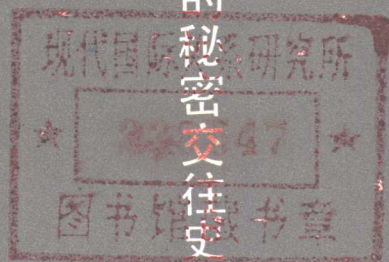
117
F822
942
抄

河豚鱼计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与犹太人的秘密交往史

马文·托克耶 玛丽·斯沃茨 著

龚方震 张乐天 卢海生 译 潘光 校



P 1993.4.20

犹太文化丛书

总 序

还是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一位跟着父母在礼拜天上教堂的同学，向我们炫耀他从那里带回来的许多小画片，精美而充满神秘气息的图画，展现着亚当和夏娃、挪亚方舟和亚伯拉罕的故事，这些神话传奇式的犹太人物连同隽美而富有异国情调的赞美诗，把我们引入西方世界悠远的初始时期，对犹太人与这个世界和人类非同寻常的关系，充满着神往和好奇。

待到步入人生和学问的大殿，夏洛克的故事又把那种意义上的“犹太人”形象放到了眼前；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报导，再也不像以往听到的犹太故事那样带有任何虚构的成分，焚尸炉呛人的气味仿佛还能闻到，对这些在基督教世界里也被称为“圣经之民”的犹太人所遭受到的截然相反的命运，则感到无限的震惊、悲哀和困惑；紧接着，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是历史故事而是眼下正发生的现实，中东纷争和战事，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犹太问题”……

然而，不管怎么说，一个几乎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相始终的弱小民族，能够在沧海桑田的历史大波折中，历尽千难万劫，顽强地生存下来，发展繁荣；一个几乎有二千年没有自己国土的“非地域性民族共同体”，成员流散在世界各地形态完全不同的各种民族文化中间，却能保留自己的传统，维持民族的团结，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社会政治建制相当原始，并且没有铁腕似的统治人物的民族和文化，却能保持自己的“族类边界”

和成员的民族认同感、诸如此类的问题，怎不会引起人们对人类秉赋和历史遭际的再思考？怎不会使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等司空见惯的概念加以再探究呢？

同时，我们还知道，被认为对当代世界有决定性影响的三位思想巨人：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都是犹太裔的人士，而我又在主持编著世界学术名著精华本的过程中，更发现许多在自己学科领域中开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都有犹太人的血统，例如法国社会学家杜尔克姆，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后工业社会论”的当代美国未来学家 D. 贝尔，新马克思主义者马尔库塞、弗洛姆，著名经济学家塞缪尔森，等等，不胜枚举。犹太裔的科学家在诺贝尔科学医学奖和经济学奖中占有非常高的比例；加上勋伯格、马勒、鲁宾斯坦、海菲茨这些世界著名音乐家的犹太背景，犹太人在文学、绘画、戏剧电影和商界的突出表现一个更具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犹太文化之谜”，不但激发起社会学家、文化学家、美学家、经济学家，当然还有史学家的理性思考，也使公众感到好奇和困惑。

我想，广大读者在接触世界文化、历史、社会的各种事物，阅读古今中外各种图书的时候，一定也有我所叙述的经验和感受。因此，作为世界文化非常独特的一部分的犹太文化问题，几乎对所有读者都会有一种吸引力。

而且，事实上，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读者，在研读世界史和世界文化史时，在钻研宗教史和宗教问题时，在思考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等学科课题时，甚至可以说，在阅读当代各种书报杂志时，都会不同程度地遇到犹太问题，关于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知识会给各自的阅读和工作，提供一种新的思考角度。不仅如此，哪怕对于纯粹研究中国史和中国文化的学者来说，这个发生在上古、至今一以贯之保留了许多原始形态的犹太文化，堪称唯

一能同中华文化作通史性比较的大文化。犹太文化(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又是西方文化之两大根源,因此,中西文化的比较必然导向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的比较。更何况,许多学者的成果显示出,犹太文化在诸如重礼教讲文化和家庭伦理等许多方面,与中国文化有类似点;还有,散亡两千年在世界其他地方始终未被完全同化的犹太人,却在遥远的中国开封完全汉化了,二次大战期间在别的地方难以安身的犹太人,在上海得到了庇护之所:这一切也就提供了又一种参照系,可以使我们加深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和研究。

《犹太文化丛书》正是完全瞩目于我们中国的专业的和非专业的读者,为大家所共同关心的这些理论课题和实际问题,提供20本左右的读本。这些读本也就有意识地在内容和著作形式两方面进行尽可能合理的结构,使之既成为了解犹太文化的基础读物,又可作为最低限度的参考书目,以供进一步的研究。

本丛书大致由4部分组成:(1)犹太人和犹太文化的概况,如《犹太人》、《犹太的事物》等;(2)犹太历史和文化史,如《犹太古代史》、《近代希伯来文学史》等;(3)犹太人和中国,如《上海犹太人》、《中犹古代教育制度比较背景中的开封犹太人汉化问题》;(4)犹太典籍和百科全书,如《塔木德选译》、《犹太小百科》等。

其中既有专门的学术著作,又有适合于公众阅读的作品;既有翻译,又有专著;专著中,除了国内学者的作品外,还有外国学者首次在本丛书发表的研究成果;此外,原典和工具书与之相匹配,不仅使丛书丰富多采,而且使之可能发挥多重的功能。

由于本丛书毕竟是我国第一套较系统地介绍犹太文化和选译犹太经典的丛书,同时此类图书即使原版在国内也不易找到,其中由中国学者研究完成的著作更具有“始作俑”的意义,因此,本丛书的出版可望填补学术研究的若干空缺,对开拓国人的阅读和研究

范围,方便检索参考,会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而由中国学者从中国读者角度选编的这套丛书,又能以其独特的文化视角和价值取向,规避宗教式的、沙文主义的、反犹太主义的选择倾向,尽量为读者提供一种较客观的眼光,一套较公允的材料。

但由于犹太文化自身的矛盾和它在世界文化和现实中的矛盾地位,因此各种著作未免有自己的色彩和倾向性。对此,我们不过分强调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是努力通过对各种言之成理的著作的有机配合,创造一种多维视野,在兼收并蓄略有差异的各种观点的相互参照中,读者有可能获得一种较为立体而客观的印象。各部著作的长处和短处也会在这一参照过程中呈现出来,读者倒可能因此而具备了一种超脱于其上的阅读主体性,可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加以阅读和鉴别,得其精髓,去其浮沫,在正常的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促使整个犹太研究水准的提高。当然,在必要的场合,我们通过著译序跋注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供读者参考。

只是我们自身研究未深,涉猎不广,加上原著原典极难得到,因此,见地未必正确得体,各种技术性的处理有可能失之不当。但我们认定这是出版社、编者、著译者和读者共同的事业,总要有人开头,必会有人继续做得更好,因此衷心欢迎指教、协助和参与。相信依靠专家和读者的批评帮助,在丛书出齐的过程中会有较大的进步。想到中国的犹太文化研究有可能伴随着丛书的出版,而得到发展和成熟,我们真正体悟了“任重而道远”这句太过通俗的成语的份量,感觉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

这种责任感更因上海三联书店各级领导和责任编辑的巨大支持而加重百倍——在如今这样的出版格局中,出版社不但保留了这套选题,而且列为重点加以扶持。这种对于学术和学者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负责精神,将成为本丛书的工作精神。

因此,本丛书得到国内外犹太研究专家的大力支持,徐向群、
阎瑞松、龚方震、许步曾、潘光、梁工、朱威烈、金应忠、唐培吉、陈和
丰等先生惠允著译,青年学者顾云深、陆培勇、顾骏、冯玮、林太等
先生欣然承担翻译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丛书的编撰已得到世界犹太研究学界的重视,愿在大家共
同的努力之下,使之成为中国犹太研究走向世界的桥梁。

顾晓鸣

于上海无花轩

1989.11.11

Marvin Tokayer and Mary Swartz

The Fugu Pla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Jews during World War II**

Paddington Press Ltd.

New York & London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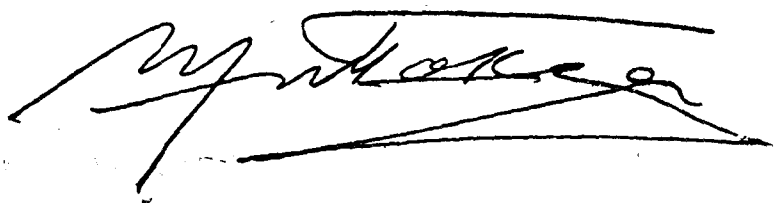
著者为中译本所写序言

当我首次访问中国时，有几天是在上海度过的。我请那位漂亮而知识渊博的导游带我们的团到上海重要而具历史性的犹太人场所去。导游对此毫无思想准备，显得有些困惑。于是，我就坐到客车司机旁边。虽然我以前从未到过上海，但我能确定这些方位和屋子。我引导导游来到许多犹太会堂，先前的犹太医院、两个犹太学校、犹太社区中心以及名声显赫的哈同和嘉道理的住所，还有和平饭店内的沙逊办公室。导游和客车司机几乎不能相信这就是我在上海的第一天，他们问我是否是魔术师。我解释道，我对虹口的街道里弄和以前的法租界了如指掌。他们问：“为什么？”我又解释，依我看来，大屠杀是犹太人经历中最大的悲剧，大屠杀是人类经历中最大的厄运，大屠杀也是一个德国人、波兰人、基督徒和犹太人共同的问题。但是，当犹太人寻求栖身之地而每一扇大门都对他们关闭时，只有中国的门户仍对犹太人开放。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中国找到了避难所。在上海和哈尔滨成长的拉比和教员们在美国已培养了整整一代的犹太人。犹太人民将永远感激在自己历史最黑暗时期中对他们善意接待的人们。

我即将再次访问中国，这次与以前多次一样，我将行走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街道和里巷中，古老而伟大的中国文化和犹太文化又

会涌现在心头。中国或许确实忘记了犹太人的经历，但历史的篇章将长久留在犹太人民的心中。

马文·托卡耶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Marvin Tokayer'. The signature is stylized with a large, sweeping 'M' and a long, horizontal line extending to the right.

感 谢 词

不可能列出所有应受感谢的人，但我们也应感谢曾经帮助过我们而本书没有提及的许多人。

如果读者对1939—1945年间各个年代和各种事件能获得任何印象，向我提供这种鲜明生动回忆的，是亚伯拉罕(Ezekiel Abraham)、别洛卡曼(Zelig Belokamen)、坎巴奈拉(Millie Campanella)、柯亨博士(Dr. Abraham J. Cohn)、拉比爱泼斯坦(Rabbi Joseph D. Epstein)、费肖夫(Benjamin Fishoff)、琴格(Joseph Genger)、戈尔兹坦(Jan Goldsztejn)、古特威特(Nathan Gutwirth)、哈宁(Leo Hanin)、意奥尼斯(Michael Ionis)、嘉道理(Horace Kadoorie)、嘉道理爵士(Sir Lawrence Kadoorie)、罗申(Irving Rosen)、特立古波夫(Alex Triguboff)和华特(Dina Waht)。他们也许是以个人的极大痛苦来分担各种回忆、感情和经历的。

包括已故的小辻诚祐教授在内的许多学者，以大量有用的事实及其慧眼来启发和鼓励我。我同样应感谢向我提供资料的杉原千畝、柴田贡、田村光三、犬塚惟重夫人和安江仙弘。

对柯冈先生(Michael Kogan)应特别表示感谢，他费了很多时间与我讨论这些年的历史，并且同意我利用他所搜集的绝密和

高度可信的日本外务省文件。

我个人谨向日本犹太社区主席雪铁林 (Walter J. Citrin) 和所有教友、社区成员致以谢意, 感谢他们的厚爱、热忱和友谊。他们有价值的回忆和持久的动力在我艰难的研究岁月中成为增加活力的要素。

无论用多少赞美词句都不足以酬谢世界犹太人协会、共同分配委员会、意第绪科学研究所 (YIVO) 图书馆、国家档案局、资料服务处和国会图书馆, 感谢它们给予我研究上的帮助和利用它们文件的许可。当翻译日本文献所需费用高昂时, 犹太文化基金会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

我非常得益于研究远东犹太人历史的三位巨匠。狄柯博士 (Dr. Hermann Dicker) 是这方面的先驱者, 他所作出的贡献成为现今和将来研究工作的基础, 对那些希望了解这一课题的人是黑暗中的明灯。我特别受惠于克兰茨勒博士 (Dr. David Kranzler), 他在许多宝贵的年月中献身于探知及弘扬上海犹太难民社区的历史和研究日本对犹太人的政策。我大量借助于他那本《日本人、纳粹和犹太人》^①, 书中对这一时期有完整的文献及富于理解力的记载和分析, 他亲切地提供了他的经验、资料 and 意见。罗文达教授 (Professor Rudolf Loewenthal) 对我的研究给予了鼓励, 准许我参考他的富有价值的论文《有关犹太人大灾难的日本和中国材料》。

作者们有时会忽视这一事实, 即出版家的用心和洞察力也许与著作本身同等重要。当本书甚至还没有可资利用的纲要并且连片言只语都没有打印在稿纸上之前, 帕丁顿出版社 (Paddington Press) 已热心地属意于此书, 我为此感谢帕丁顿出版社的爱里希

① 该书中文版易名为《上海犹太难民社区, 1938—1945》, 为本《犹太文化丛书》之一种, 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译注

(Richard Ehrlich)和最初替我们牵线的约瑟夫(Alan Joseph)。

最后,我非常谦恭地接受我的婚姻赐予的福份,因为是我的妻子打出了第一份原稿,她的鼓励和平心静气为现在的每项成果作出了贡献,不论将来出现什么问题,她都会对我支持到底。

马文·托卡耶

导 言

1934年至1940年之间，日本政府最高当局设计了一项秘密政策。它本可能会拯救上百万的犹太人免遭希特勒的大屠杀，甚至可事前阻止日本与美国的战争，此即河豚鱼计划(Fugu Plan)。这项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以募集有才能的欧洲犹太人及美国犹太人的资本、影响和同情等为手段，来构筑20世纪的日本帝国，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

对河豚鱼计划的设计者来说，在30年代，犹太人似乎拥有日本正缺少的东西。日本帝国因侵略而迅速扩张，但它需要如罗思柴尔德(Rothchild)、贝尔纳·巴鲁赫(Bernard Baruch)、耶柯勃·歇夫(Jacob Schiff)等人所具有的资金和理财才能。它特别需要有经验的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定居在空旷的“满洲国”(满洲，日本新征服的中国北方“殖民地”)，从而建立一个安全的缓冲区以抵制苏联的威胁。最后，日本寻求改善它在世界上的形象，以扭转西方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的趋向，因为它们已开始反对日本。设计者相信，对这样的任务，犹太人最为合适，因为据说他们控制了众多的美国报刊、广播媒介和电影业。

为报答犹太人帮助日本解决这些问题，日本准备为犹太人提供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安全港。当时，欧洲正兴起一股愈演愈

烈的反犹主义浪潮，而日本既无反犹的传统，又对此没有任何兴趣。在信仰神道教的日本，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反感在这里毫无影响。河豚鱼计划的设计者认为，日本人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似乎是上天所安排的。

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河豚鱼计划的创造者们在开始自己的构想之初，就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首先，他们大大地误解了作为整体的犹太民族的本质。（这几乎很难避免。多少年来，日本人有关世界犹太人“知识”的主要来源是一本声名狼藉的以虚构作为事实的反犹书籍《郇山长老议事录》^①。他们的第二个误解是有关犹太人在西方世界作为经济因素和政策设计人的重要性。日本人以这两个基本的错误作为他们计划的基础，就不能不使他们的建筑倾斜。尽管作了大量的研究，日本官员却始终不能理解犹太人状况的某些重要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犹太人社团认为他们同政治家庭美国的连结至少和他们与欧洲的宗教家庭的连结一样牢固。河豚鱼计划的执行者不理解这一点，因而也就不理解1939年冬当他们向拉比斯蒂芬·魏斯(Rabbi Stephen Wise)提出建议时，他们所遇到的不仅是美国犹太人的主要领袖，而且是一位把对美国的忠诚和热爱视为神圣的犹太人。如果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据此来和他交往，则同魏斯会谈的结果及河豚鱼计划本身的成果或许就完全不同了。

我本人从事河豚鱼计划的研究始于1968年，那年我举家迁往东京，虽然当时我还不清楚该计划的内容。但一出任日本犹太社区的拉比，我就立刻得以聚集一些“会说话的书”。随着第二次世界

① 这个文件是俄国警察局巴黎办事处在1901至1905年期间炮制出来的，于1905年发表。文件中捏造有一个国际性的犹太人运动，旨在消灭基督教组织，建立犹太人对世界的统治。1921年，伦敦《泰晤士报》曾揭露它是一个伪造文件，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大骗局，但仍有人以此作为反犹主义的借口。——译注

大战的结束，特别是1949年以后，实际上所有曾是上海外国社区一部分的犹太人都离开了那里。其中有许多人，特别是一生住在亚洲的犹太人都迁往东京。最初，我只是简单地与他们谈起我在纽约希伯来高等学校听我的老师们谈到的他们作为难民在上海和日本的经历。当我在东京的教友们谈到他们听到的奇闻逸事时，我立即为他们的故事所吸引，并佩服他们的生存能力。我想到尚没有人将这些非凡的经历汇集起来，于是就以更为有计划的形式去拜访我的教友。3年中，我作了笔记，录下了谈话内容，并且熟悉了有时几乎难以置信的故事：上千波兰犹太人从一个轴心国的魔掌下逃亡到另一个显然受欢迎的国家。然后，在1970年初，我看到了柯冈文件(Kogan Papers)。

柯冈文件是一部战前日本外务省文件的合订本，它被发现于东京一家旧书店的后堂，以后转归犹太居民柯冈(Michael Kogan)所有，十卷文献中每一卷都打上一个圆形秘字(maru hi，即秘密)。构成柯冈文件的报告、研究和命令的原件就像战时日本政府的所有文件一样，在日本投降后被盟国占领军没收，并送往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但是由于大多数这类文件都有副本，所以在战后初期，像柯冈文件这类额外的副本出现于市场并非罕见。柯冈的日本语很是流利，当他浏览了某些葱皮纸上的内容后感到非常困惑：“满洲犹太居留地”这种胡说指什么？日本控制满洲时期，他本人曾经在哈尔滨——满洲的都市生活过。他当然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某一天，柯冈来与我讨论这些文献，恰巧有一位日本同事加濑在我的办公室谈一篇他正在为我翻译的文章。世界确实很小，加濑的父亲正是战前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的秘书。有趣的是，他详细地研究了整卷文献后发现，松冈在这些文件所述及的事情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其中包含的操纵世界犹太人的计划被非正式地称为“河豚鱼计划”。

在加藤告诉我柯冈文件的内容之前，我只是积聚了一些犹太难民对 30 年代和二次大战期间在日本和上海生活的回忆录。现在我认识到，这些人与其他一些人已不知不觉地被卷入了一连串更为复杂的事情中去了。以发掘柯冈文件作为起点，并得到日本国会图书馆档案以及日本陆、海军和外务省中许多官员的帮助，我开始竭力去追寻尽可能多的真正参预了河豚鱼计划的人。虽然该计划最早创建者之一海军大佐犬塚惟重已经去世，但他健在的夫人却应我的请求答复了许多问题。安江仙弘陆军大佐的儿子也是如此，安江仙弘是一开始就参预这项计划的一位官员。此外，还有前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贡，河豚鱼计划的纽约联络员田村光三以及文件中提到所有尚健在的犹太人，不论他现在以色列或香港的，甚至实际上就在东京与我近邻的。

这是一种富有魅力的调查。例如，我与柴田一起呆了数小时，提出问题，不断更换录音机上的磁带，并且知道了柯冈文件官方化的人事背景。

我问柴田：“你在上海与纳粹上校梅辛格 (Meisinger) 会晤，一开始讨论到他所提出方案中的最终解决办法时，你的反应如何？”

柴田稍微摸了一下他的圆颧，时隔 30 多年，他的记忆还是清楚的。他说：“我只感到恐惧，先前传闻的一些暴行的轮廓已直接显现在我的眼前。但我感到无能为力。我是一名忠诚的日本人！他们是我们的同盟者。我必须按照我上司的计划行事，不论其怎样残酷。直到后来我坐在外白渡桥旁边日本领事馆的花园中时，我还在想我应该做些什么。”

柴田和其它一些人为了若干记忆不清的名字和事件还查阅了他们的日记。毫无例外，尽管最初接触到他们曾计划和做的一切时，他们显得尴尬，但每个人总的来看都是诚实的、易于接近的。

1976年，我辞去东京的职务回到美国。我相信那些错综复杂的有关难民及他们卷入的河豚鱼计划的故事值得重视，而且应使之不仅只有我的朋友们和将来的教友们知道，为此我请东京犹太社区的一位成员、专业作家玛丽·斯沃茨(Mary Swartz)予以协助。更巧的是，她同时也回到了美国，合作的步骤确立下来，这一合作产生了这本书。早在我们准备草稿的时候，就曾遇到了尊重历史事实还是进行历史虚构的问题。我们都强烈地感到，既然整个一系列事件都是事实，我们决不为了戏剧性效果和有特色的发展去作任何变更。但是，为了更好地表现难民经历的情味，我们决定从上海犹太人所告诉我们的无数奇闻轶事中塑造出9个复合的人物。结果在书中出现了9个虚构人物。即阿夫伦·契思诺(Avram Chesno)、盖尔松·戈亨(Gerson Cohen)、扬克·纪勃维兹(Yankel Gilbewitz)、默舍·卡兹纳尔逊(Moishe Katznelson)、苏菲·卡兹纳尔逊(Sophie Katznelson)、契娅·锡尔金(Cheya Syrkin)、盖策尔·锡尔金(Getzel Syrkin)和他们的儿子大卫(Dovid)，还有奥良斯基(Ephraim Orliansky)。我们通过这些人物来表现成千上万犹太人得以逃脱大屠杀在日本和上海生存的真实经历。

除了这9人以外，书中所有人物都是真实的，而且他们各自都是在合理的范围内重述这段历史，这里仅仅是介绍他们所说过的和做过的事。

马文·托卡耶

1979年